

冉云飞 | 作品

庄子我见

我常把一个人在精神上的矛盾，
看做活力无穷、魅力四射的象征。
矛盾造就了庄子的魅力，
代表着他对自身局限所作的超越性努力，
尽管未能实现。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冉云飞 | 作品

庄子我說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我说 / 冉云飞著. — 北京 :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77-0031-9

I. ①庄… II. ①冉… III. ①道家②《庄子》—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210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庄子与我们的 日常生活

拙著《庄子我说》近十年后重版，本想做一些补充，无奈手中写作任务非常多，没有办法做除修订正误外的其他改进。好在我于2009年主编并出版了一本《庄子二十讲》，选了这一百年我认为比较有意思关于庄子的文章，朋友们可以从中酌参。故此将2012年9月为长江商学院的朋友们所讲的关于庄子的一点心得整理出来，作为再版的序言，也算是对《庄子我说》正文的一种补充。我始终认可顾随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那么我之讲古诗文，自然不是抽象地只讲知识，其中一点便是说这些知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甚至就活在眼前。

◇ ◇ 一：当下生活中的庄子

一个死去两千三百年的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系么？用四川话说，你简直“哄鬼麻广广哟”（意谓欺骗人）。人是与草木同朽的，问题在于有活力有魅力的思想依旧牵系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多人不明就里，甚至下意识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来自于庄子，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比如我们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其“天府”一词原创即来自于庄子。又如成都人称那些不成器的耍家为“散眼子”，亦来自于庄子里的“散焉者”。再如“大梦谁先觉”里的“大梦”，形容人死之“物化”，均来自于庄子。这样的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在许多方面庄子可谓有发明之功。从研究文化、思想、哲学、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角度，《庄子》一书的开创性，其中蕴含的语源性，绝对值得研究者深深注意。

人所共知的“神仙”一词，固然不是庄子发明的，但其提供了语源性基础，即由神人到仙人，再发展为“神仙”。他在《逍遥游》中所描写的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从其形貌，到风餐露宿，不食人间烟火，水火不侵，任何外物都无法伤害他，都与后世的神仙并无二致。他甚至开玩笑说身上搓点尘垢下来，就可以铸造超过尧、舜一样的帝王。除了对儒家帝王的嘲讽，与后世的神仙“职业”不侔以外，余下基本一模一样。小时家慈看见我用手直接搔痒很厉害，就告诫我说，不要抠破皮要肱腋。四川话读“肱”若“冠”（其本音读若“换”），小时家人常说的“肱腋”不意在《大宗师》“以死为决肱溃痛”句里能够看到。“肱”字在康熙字典里的解释是“搔痒而成的

疮”。再比如我们四川人说一个人耿直讲义气，就喜欢说这个人真是“直矼矼的”，其实这样的字也同样来自于《人间世》里孔子说颜回之所谓“德厚信矼”，你厚道讲信用，脾气直矼矼的。如此看来，其实《庄子》里不少东西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只是不少人并不知道而已。

我曾说过，任何人都是活一天少一天，没有哪个人是越活越多。用德国哲学来说，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其实庄子早就更深刻地表达了这一层意思，他在《逍遥游》里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一旦你被父母生下来，那就想死的自由都没有了，只有等几十年后慢慢死掉。庄子倒不同意后世那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言论，而是说你不自由的生活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因为你“有所待”。“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一生生活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能自己，每天跑向死亡，如同野马狂奔，你不能制止它，因为白驹过隙。换个说法就是“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别说人们一天到晚钩心斗角，就算没这事，也只不过是在向着死亡的道路上奔跑，是没有人能够劝得住的。到最后糊里糊涂、莫明其妙地过完一生，正所谓“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难道这不是两千多年来，我们至今为止也没有完全想透的人生哲学吗？

与人斗与天斗的哲学，经“伟大领袖”号召后，非常流行。但这东西并不是他的独创，只不过结果谓之“其乐无穷”，倒是他的独得之秘。反对斗争哲学的庄子早就说过，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是“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就是说人们成天背毁面誉，边整边拉拢，仿佛二十四小时都处在与人相斗的谋划之中。因为没有互相信任，又没有

良性的制度保障人们的日常博弈不出问题或者少出问题，故难免“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小的恐惧使你惴惴不安，大的恐惧会把你吓瘫散架。你卖我毒大米，我售你毒奶粉，你售我毒奶粉，我在学校愚弄你的孩子等等，不安感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地蔓延，没有任何可能逃脱的例外，我把这种状态称之为“互害社会”。可叹的是，庄子提前说了两千多年，到如今我们都没有解决这种“小恐惴惴，大恐缦缦”的生活。

庄子当然也不是完全无争，彻底不斗。他与惠施的辩论就很精彩，他之骂曹商而产生的著名国骂，在先秦诸子中无出其右者。我们很多人都骂过人，也被人骂过，我想在座诸君也不免。庄子很穷，打草鞋以谋衣食，曹商就来揭他的短，驳庄子的面儿，让庄子很难堪。曹商得意地说，如果比谁更穷的话，我曹商自然没办法跟你老兄庄子相比。这不是故意寒碜人吗？在座的你们都应该算是富人，我想其中没有曹商这样掩不住要炫富的人。如果不幸有的话，最好不要碰着庄子这样的骂人高手，不然下面的话会让人十分难堪。庄子骂道：“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听说秦王背生痈，肛生痔，舔前者得车一辆，舔后者得车五辆，你得这百辆车难道是吮痈舐痔二十次所得的报酬吗？小子你真行啊。我们四川人现在说某人下作无行，一般都说这人是舔沟子（屁眼）的人，大约是从庄子老师那里学来的。

《庄子》是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着力点。大到社会制度与变革，小到我们现在所取的名字，都可以在此间找到渊源。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书斋号名为“饮冰室”，出自“今吾

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人间世》），意谓自己对社会有相当之责任，因此需要平复自己的内心、止住自己的焦虑。诗人邵祖平的《培风楼诗》之“培风”，大约也算是出自《逍遥游》中之“而后乃今培风”，体现了心气很高的邵先生在写诗做学问上的自我期许吧。咱们四川的古典文学学者周虚白的名字，出自《人间世》里的成语“虚室生白”，把内心的大扫除做好，一个人就可以悟道而达澄明之境。

我的高中同学梁鹏，复旦大学学哲学的，读书很厉害，如今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是搞房地产的。其名应来自庄子，因其父在我们那地方算是有文化的。等梁鹏有儿子后，他干脆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梁扶摇。父子相继，以名和字相关联的通行古例，儿子的名字甚至可以作父亲的字。“扶摇”一连读就是飙，当然也可以叫梁飙，但梁扶摇听上去更有节奏感及韵律。宋代的著名道家人物陈抟老祖，这个“抟”字来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他的字“图南”，则来自于《逍遥游》里的“而后乃今图南”，而“图南”连读亦可为“抟”。可见我们生活中不少人连取名都与庄子有关，就更不用说我们寻常说话之受影响了，从下面我即将要谈到的《庄子》一书的很多成语，就可以略窥端涯。

寻常的说话并非不值得注意，因为“道”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庄子说得更绝，“道”在屎尿之中。“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真的大道理看上去是寡淡少味，而那些欺骗性言论则天花乱坠，没完没了。这和“是真佛只说家常话”是一个道理。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用成玄英将“炎炎”释为“猛烈”来主张我所说是错的，因为有人把这句话释为夸海口的言论总是很猛烈，耍小聪明的言论总是废话连

篇。我比较同意流沙河先生的说法，炎应为读为“淡”，因为大言在庄子看来就是真正所谓的“道”，“道”不装神弄鬼。就像他用“大宗师”形容道一样，“道”不是哪个人可以垄断的，也无法送给亲戚朋友，或者拿来倒卖赚钱，当然可以拿来自我愉悦。这就像道家人物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一样：“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 ◇ 二：《庄子》成语统计研究

经历两三千年的历史绵延，先秦诸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来源之一，其各个方面均被人们全方位地研究，似乎罄尽了所有的角度。先秦诸子里，我们至今仍在运用的成语、习惯用语（俗语、谚语等）非常之多，这可以事实上判断文化传承有内在逻辑和相应的活力。能够固化为“成语”，这一定是该语词有相当大的传播力和使用空间。在众多语句的残酷竞争中，有的是因为故事搞笑，有的是因为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有的是因为说理透辟，有的是因形象鲜活，千载之下仍如同目前，故脱颖而出。要言之，任何语句要脱颖而出，均非幸致，能够流传于今的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世间有很多语言说了即死，因为许多人所说的都是废话，废话当然说了就如风吹过。除了有史料癖的人从中去梳爬研究外，普通的读者便无法对他们有什么记忆。

但关于先秦诸子里的成语之研究，特别是《庄子》里的成语分析，我只零星地看过一两篇零散文章。比较全面的是我在网上读到的边馨2007年所撰的硕士学位论文《〈庄子〉的成语研究》，尚未看到

像样子的专著出版。边馨的论述和分析不够深刻，而且分析角度只是用语源、成语定型方法、意义分类、修辞方法等，无非是在语言学内部而非从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语言传播学等方面，进行视野开阔的研究。但客观地说，她在资料搜集上做了不少工作，只是对资料处理的视野不够深广，或许囿于她自身的研究范围亦未可知。

有人统计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共收词语5500条，注明出处的4600条，上古至秦汉时期共3128条，占68%；魏晋南北朝时期690条，占15%；隋唐时期414条，占9%；宋朝276条，占6%；元明清三朝92条，占2%（倪宝元、姚鹏慈《成语九章》，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边馨《〈庄子〉的成语研究》）。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越到晚近成语所占比例越少，那是因为语言活跃，还需要一个汰弃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一个凝固期。但这也不足以完全解释上古至秦汉所占比例为何如此之高。我没有研究过西方语言里成语（含俗语、习惯用语等）的形成是不是呈现像中国这样逐渐递减的现象。不过若说中国语言里的成语有个逐渐递减的过程，但俗语和习惯用语却未必如此。因为成语比较书面化，而俗语则因时代和口语而生，上个时代的口号在这个时代或许就需要专门解释才能让人懂得，而成语让人懂的概率远超过非常有时代性的俗语。成语在意义上有个对时代的超越性问题，虽然成语往往有原初义和引申义（或者居于彼时语境之义）的两个层面问题，但成语不断重复地使用，表明其在语言使用中有相当的通约性。

从以上所看成语的逐渐衰减过程，其实还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原创力似乎有一种衰减过程。因为成语生猛而久远的传播力，正好表明其语词的原创性对当下和后世的深远影响。语句转为成语，是语

言竞争和社会及人们选择的结果，从某种文化意义上说有一种不可控的自发生长秩序。这种自发生长秩序，当然会受制度及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如没有士人和民间力量的传播，只凭官方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传播广度和深度。换个角度来观察，从上古至先秦所占成语比例的68%到明清的2%，不只是可以看出文化原创力的衰减，也可从中观察出随文化原创力衰减的同时，文化的内在越来越板结。如果说成语的诞生，意味着某种大家所共通的文化事物得到了强有力的传播，那么反过来证明缺少这种强有力的传播者，正好表明文化的活力出了问题，大家都躺在前人创造的成语上睡觉。老是袭用前人的成语，而不思自己创新，久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其实这可能与我们各种文体上都好用典，而不尚“唯陈言之务去”有关——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喜欢向后看，由此形成厚古薄今的习惯思维。向后看与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反过来又使文化板结且原创力下降，最终导致文化发展上的恶性循环。

边馨还援引了刘方华对《精编成语辞典》的成语统计，注明出自先秦诸子著述的成语分别为《论语》178个，《孟子》159个，《荀子》49个，《老子》32个，《庄子》180个（刘方华《先秦诸子思想成语化简论》，载于《岱宗学刊》2002年12月，转引自边馨《〈庄子〉的成语研究》）。不包括《韩非子》《列子》《墨子》等在内其他先秦诸子的统计，自然是不完整的。但从传播学和影响力的角度来看，未列出《韩非子》等也不会影响《庄子》成语名列榜首的事实。《庄子》里的成语为何如此之多，竟名列先秦诸子之榜首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正如边馨所分析的，《庄子》有一个特点，在先秦诸子里可谓别具一格，那就是“直述式成语少，描述式成语多”。这

是庄子与其他先秦诸子不同的一个特点，庄子擅长于讲故事，诙谐形象，这些都使他的成语有不同凡响的传播能力。

当然由于每个人对成语的理解以及统计方式略有差别，因此关于《庄子》一书有多少成语，目前尚有分歧。如刘洁修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里共收出自《庄子》的成语210条，而《中国成语大辞典》里只收了出自《庄子》的成语127条，相差93条。显然在对成语及其出处的认定上，双方有着不小的认知差距。边馨根据对两部词典的比较，自认为出自《庄子》的成语有172条，为庄子原创者有158条。以这样的比率来看，庄子成语的原创性高达90.2%。这与庄子书中本身的原创性也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他是少数对天空大地有探索和疑问的人，除了屈原以外，先秦诸子没有任何人有像他这样的思索。至于他那些浩瀚汪洋的比喻，诙谐恣肆的调侃，出神入化的寓言，亦是远迈其他人。出自庄子的172条成语中，与神话、传说、寓言有关的就占46个，占原创的29%。这也从数量上来证明《天下》篇对庄子一派的评价：“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成语是经过人们与社会长期筛选、取舍、斟酌、使用的结果，它就是重复率比较高的语言，所以成语又与谚语和习惯语有深刻的相关。对成语进行数字统计，以便找到相近的成语及其规律，从而找出传统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何在。这公约数里包蕴着什么的内容，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判断。我们总是在那里只凭印象如盲人摸象，却不愿意做精细的数据研究。两千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做关于先秦诸子里的成语之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面上看《先秦诸子成语数字统计》

这样的论文或者著述好像没有意义，其实这才是研究传统文化比较真实有效的方法。若能加入社会科学的方法，才会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别开生面，更上一层楼，这一点不少汉学家的著作已经给我们做了较好的榜样。如果我们研究传统者还是因循不变，那么我们就很难研究出什么新意，大家都在转述稗贩，凭空臆想，不知所谓。

◇◇ 三：没有未来与知识中立

2004年拙著《庄子我说》初版，一年后自序《庄子使我上瘾的几个理由》，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阅读教材。虽然觉得是一份荣誉，但由于我研究语文教材有年，觉得拙文入选，对一贯不善于独立思考，只偏于机械记忆标准乃至唯一答案的学生，或许有点深。我的书《庄子我说》主要是自己对庄子的一点浅见——主要体现在文化阐发、政治评论等方面与当下现实的勾连，算不上是什么学术研究，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学的点评。序言里我提到《庄子》一书里的矛盾才是庄子活力之所在，游戏态度是庄子的精神内核，还提到他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虽然他竭力提倡谴是非、立环中、齐万物，但事实上他本人的思维方式就非常吊诡地深陷于他所反对的路径之中——自认为最有意思的提法是没有未来的向后看的思考路径。前三者姑且不说，我认为最后这一点其实不但说中了庄子及先秦诸子的弊端之所在，也算是击中了中国文化的弊病之所在。

为何中国几千年来，有非常多的道德至上的表演者，他们不被揭露，甚至有的还被拿来让民众学习，其主要的问题就是因道德与法律的错位。不相信在良性法律保障之下的公序良俗，却相信那种没有

制度保障的道德表演，于是人伪成风，这是庄子痛加批评的。由于没有良性制度保障人的权利，那么每个人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包括先秦及其以降的中国文化，都对未来社会缺乏理性预期，对未来没有理性预期的人很难建立相应的道德感。短视、胡来、做事没有底线，会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盛行，“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会成为官民共同信奉的哲学。越是做事没有底线，就越是是没有对未来的理性预期，社会便会形成一种难以治理和建设的恶性循环。

虽然庄子也批评过厚古薄今的做法，甚至说这是文化人的通病，如他在《外物》篇里说：“夫尊古而悲今，学者之流也。”但他对“至德之世”的推崇，却和其他先秦诸子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无法证明的上古三代，令所有的中国文化人俯首称臣，这应该算是文化思想史上的奇观。他们看得到当下的不美好，在法先王之法之外，却不敢提出真正替代和治理当下不美好的制度的措施。就像康有为也要打着孔子的旗号，才能抬出他变法的理想一样。没有一个人敢独立而无所依傍地拿出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制度变更方案，因为改革方案不仅需要具体的操作和实施，更需要打上古圣先贤的思想印章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合法性。不然的话，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社会里，谁敢拿出“不著心源傍古人”的决绝，将自己的独创拿出来呈上？

但问题在于，哪怕不是具体的改革方案，只不过是思想上开出一个治理当下、使社会有理性预期空间的方子，自古而至清末立宪之前也并没有这样的人。这的确是言论不自由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的莫大束缚。不过，问题在于大家一直只知往后看，往一个根本无法证实的上古三代去寻找批评和变革社会的思想资源，其雷同乏味，乃至无聊就是必然的。庄子一直主张无为而治，觉得上古至德之世是无为而

治。但这也许是他的臆想，古代人生存不易，哪能做到所谓的无为而治？哪怕是部落之间的战争，也促使人们不可能无为而治。何况进入了准国家的政府治理状态，怎么可能做到所谓的无为而治？虽然我承认无为而治里有不折腾老百姓的成分在，也有点小政府大社会的影子，但在他的著作里终究并没有直接言说出来。无为而治到乌托邦的地步，那也是不现实的，他又不可能达到今天民主自由理念的地步，所以在看他的政治理念时，我大多数时候是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的。

虽然庄子和先秦诸子都是向后看的思考路径，但他也用自己卓越的见识和想象力，使得自己一些看法颇具前瞻性。他对现代文明的社会批评，虽然建立在物质并不丰裕的时代，但其对人的贪欲所做的针砭，却是不容抹杀的。不过他欣赏不用桔槔的灌园叟，说用机械者必有机心，必然投机取巧，还是过于胶柱鼓瑟了。如果人类社会一味向后看，而且不向前发展的话，那么连语言文字都不会发明出来，那么我们连庄子是谁及其思想，也无从知晓。这就像倡导不立文字的禅宗一样，进入了不能自解的悖论之中。自然，你也许会说庄子根本就不重视逻辑，他常开惠施的玩笑，对于他来讲或许不存在什么悖论之说，因为他一直站在环中。其实，处在环中谈何容易？对于现实应对来讲，那只不过是个文字游戏而已。我承认从思考上比较自治的角度来看，处在环中是个说得过去的一种讨巧想法。

那么庄子的一些前瞻性或者说预言性的说法，体现在什么样的章节呢？最让我惊异的是《庚桑楚》对千年后世事的准确预判。庚桑楚作为老子的门徒，习得老子无为而治的精髓，居然使畏垒地方的民众三年过后就大丰收，因此民众就来拥戴他朝拜他，认为是他是圣贤。但深得老子之教的庚桑楚大为不悦，故他借此大力抨击尧、舜两

人之治理国家，给民众带来的伤害。“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阤。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尧舜之治在儒家文献里，当然是表彰逾恒、常说不衰的话题。不过庄子由尧舜推出的这一系列在他看来必然发生的乱象，也的确在后世频频出现。十分惊人的是，他通过庚桑楚预言的千年后果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只要你稍有联想力，以及对当代史的现实感受力便会被这个预言给镇住了。饿死的人也正如庄子《大宗师》里所说：“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把死的人放在山沟里量，比那里的小草树木还多，民众的悲惨真是没办法形容了。

庄子何以能看上去这么准确地预言如此残酷的事情会发生呢？庄子当然还只是从人伪的角度来判定必然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他并没有特别高妙的招数。事实上这个判断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能找到太多的反证。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用庄子的标准，他的人民和官员也必然都是人伪的，但为什么他们不会出现其所预言的人吃人的现象呢？显然这不是庄子所能解答的。庄子对社会的批评不乏犀利，但其所开方子未免经不起检验。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制度文化的短板，是一个全民包括文化人共患的整体并发症。我们或许可以在古书里所蕴藏的具体行政运营上，找到些为今天所用的例证。但遗憾的是，在制度接续和生发力上，我们很难找到相应的古代资源。

这当然不是说《庄子》里完全没有可以拿来应对社会管理的正面办法。《应帝王》《马蹄》《庚桑楚》等像庄子其他篇什一样，他提倡帝王们无为而治，官方不要玩弄老百姓让老百姓感恩那一套把戏，“吃水不忘挖井人”只不过是一种以恩人自居的巧佞化妆术。因

为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是你管得好，而是你管得少。管得少怎么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呢？那就是让老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实行民众参与自我管理的社会自治。而《在宥》一篇更从标题上——虽然这标题有选篇首前两个字而成的随机性——就体现了要让民众自治的意思。在之，宥之，意思就是：放置他，宽让他，让他们自己做主。有人或许要误解，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要政府有什么用呢？政府并非什么事都不做，如外交、国防、警务等方面，替纳税人代行公共管理职权，但在民众的大部分生活中，应该让其自治。正如郭象之释“无为”时所说：“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无为就是放弃他人整治你，而是你自己管理自己，自治就是民众各乐其业，各安其生。正如流沙河先生所说，庄子的无为主义应该是社会自治的滥觞，值得我们在吸取传统精华时加以注意。

与社会自治一脉相承的是，庄子的无为反对对环境的破坏，质疑文明带来的好处，这也值得我们今人细心辨识。但庄子因反文明而反知识，与老子一样主张绝圣弃智。《天道》篇里有木匠讽刺齐桓公读往圣先哲书的著名例子。他的意见是，读先王书，因并非先王本身，所以“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但正如流沙河先生对此的辩护，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读书如秉烛，固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但总比摸黑好”（《古之读书无用论》）。知识自然是有用的，否则庄子何以能写出《庄子》，并传播自己的思想？就算我们不执著于知识之有用与否，也应该深晓知识的中立价值。知识的中立，最后靠的是法律和道德，来使得有些知识的流弊得到有效的遏制，使知识的益处能得到比较畅通的传播，而不是完全杜绝知识以及它的繁殖能力，最终成为盲昧的人。